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周晔

“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何以紧密结合起来

■高帆



不是将人作为“工具”或“生产要素”，而是将人作为投资活动的实施者、投资过程的评价者、投资绩效的分享者

推动劳动工具的优化和劳动对象的扩展;后者主要是指投资于教育、培训、生活环境等方面,从而推动劳动者劳动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在投资方式方面,强调人和物两类因素的结合协同功能。人和物两类因素不是相互独立、彼此割裂的,而存在着相互协同、彼此嵌入的关联关系。在经济发展史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变化总是需要劳动者能力随之发生变化,以此形成要素之间的功能协同效应。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汽车和自动化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和信息化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导致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形态变化,也引致劳动者技能随着科技和产业革命发生变

化。反过来,劳动者在素质和能力提高之后能否发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形态紧密关联。这意味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不是两个相互分割的过程,而是需要依据产业和技术特征进行组合式投资的过程。组合的关键在于人和物两类因素能够相互匹配、适应和嵌入、赋能,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在投资主体方面,强调市场机制和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国民经济是一个由多种主体组成、彼此之间存在结构关联的整体系统。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需要依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方式来提高整体投资效率。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其投资涉及对利润或收入等的研判;对于政府而言,其投资涉及对增长及就业效果等的研判。我国是具有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意味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需要市场力量,也需要政府作用。例如,特定企业基于利润获取考虑,积极投资于技术发明、设备更新或员工培训,就体现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投资额度高、风险大、周期长的基础研究领域,在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特征显著的基础设施领域,在外部性特征明显的基础教育以及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政府依靠“看得见的手”进行投资则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投资目标方面,强调投资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把“投资于

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一个根本指向是通过投资对象、方式、主体的组合形态,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全球产业竞争已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对人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人力资本红利”。要重视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投资。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高品质生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之举,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不是将人作为“工具”或“生产要素”,而是将人作为投资活动的实施者、投资过程的评价者、投资绩效的分享者。一方面,强调“投资于人”本身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本身就是城乡居民发展型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转型,城乡居民的发展型、个性化需求将渐趋增长。另一方面,“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建立“投资—消费—创新”联动机制,统筹宏观经济短期动态平衡和长期高质量增长,有助于切实提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并在有效益投资与有潜能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

态平衡。

进一步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是夯实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的战略支撑,应当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联系,依靠完善生产关系、完善经济体制机制来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各类要素在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流动中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来激发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力,以此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提供持续牵引力量。另一方面,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促使地方政府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创新而竞争”“为民生而竞争”等,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乡居民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的财政投资力度,进而充分发挥政府在投资组合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以此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落实落地提供坚实依托。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

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如何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钥匙。

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正确政绩观树牢思想旗帜。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志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客观实际,避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员干部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政治定力。

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将其归纳为“实事求是”,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层层加码、乱铺摊子,本质上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政绩观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既有时间广度和成效深度的内在要求,又具有显性表征和潜在作用的双重意蕴,需要把握好现实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第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正确政绩观锚定价值取向。

政绩观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党的初心使命的具体表现。围绕践行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的价值旨归,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反对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反对竭泽而渔、劳民伤财。相关重要论述为回答“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提供了重要遵循。

必须意识到,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优绩,是对初心使命的践行,是为了造福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新时代新征程,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消除影响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消极因素,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担当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第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正确政绩观指明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给出了“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即党的自我革命,并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要求。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新时代新征程,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第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正确政绩观确立根本原则。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回忆:“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看,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性坚强之源,党性坚强是正确政绩观之基,三者相互滋养、相辅相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尹韵公

改革开放形成的大格局、大发展,需要锤炼出与之相匹配的大理论、大思想。当前,我们正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世界诸国学术发展史的经验证明:任何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历史的长期积累,更依赖于现实目标的强烈追求。倘若没有目标追求,就会丧失学术砥砺的张力,或缺损学术生动的活力,或丢掉学术脉搏的动力。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遵循新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要使其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既要有各国新闻学的共同特征,更要有基于自己国情的突出特点。

锻造有理性性的新观念、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毋庸讳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类别、学术逻辑、话语表达、方法路径等相当程度上仍是西方舶来品。许多学术论文的写作面孔也模样相似:先拎出一个西方理论框架,再找来一堆中国例证

往里填充。如果没有西方理论作为假设主线,似乎就意味着论文没有学术品位。思想的短缺和理论的贫困,不属于中华民族,也不应该属于中华民族。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丰富的实践是我们奋力书写的,深刻的理论也要靠我们精心总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和着重点,就是要提炼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标识性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现实逻辑是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浓厚时代底色。当前,国际局势进入一段大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各国正经历百年罕见的重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兴起给全球面貌带来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实际上呈现了传统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打击与反打击的错综复杂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一现实逻辑,给世界舆论场以深刻影响,对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文明充沛社会各个领域乃至各个角落是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技术

特征。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深刻演变,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改变着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方式。“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体系”(未来学家托夫勒语)或者“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全球要素资源的重配、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也意味着全球传媒领域和市场的重组。”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工业文明带来了现代化,数字文明大大加速了现代化步伐。数字技术的信息化对传媒生态产生了深刻变化,对传媒结构带来了深刻调整,对传媒思想赋予了深刻革命,必将为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启发和支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大势和传媒背景下,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而且必须紧紧抓住以下主体性理念和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及党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前途命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媒事业,必须把政治上的坚持党的领导转化为行业上的坚持党性原则,无论传媒格局怎样变化,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正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一样,

我国的新闻学与新闻体制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注重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管理性支撑、贡献学术化支持。比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直视舆情风险,善于引导舆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的诸多弊端,充分发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对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大作用。

二是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准群众脉搏、回应群众关切、体现群众意愿、增进群众福祉,努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万物皆联、万物皆通、万物皆闻的时代,人民群众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是主角;不仅是信息发布者,还是信息传播的参与者,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者。新时代新征程,要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贯穿于新闻研究与实践之中。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初见成效,但仍有一些概念需要厘清,一些理念需要提升,一些路径需要细化。比如,系统性变革的“议题清单”有哪些,主流媒体组织内部影响要素之间如何建立协同运作关系,主流媒体变革如何应对制度实践场域的复杂结构性矛盾……深入新闻实践的广袤田野,回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切,我们的学术才不会是空谈泛论,才不会是面朝房间角落里的自言自语、孤芳自赏,才有可能产生影响社

会的现实抵达率。三是坚持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突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全球的现代化,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诸多方面紧密相连的现代化。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这决定了必须要有一个有利于发展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坦率地讲,西方一些国家和势力极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也极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它们企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资源力量,利用强大的国际舆论机器,千方百计地污蔑、诋毁、攻击、打压和抹黑我国形象。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云谲波诡,我们要突出和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阐释中国主张、中国理念,倡导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细述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展示中国力量、中国气派,详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价值、意义,让各国人民更多、更深、更广泛地知晓中国、理解中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深层破坏,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传统腐败。如果仅靠传统手段被动应对,难免陷入“牛栏关猫关不住”的困境。

“微腐败”看似涉及金额不大、层级不高,但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如同蚁穴般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统领——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既要要求

性,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回潮。小病不治,易成大患。必须深刻认识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基层延伸,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一项关乎人心向背、关乎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任务。

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统领——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既要要求

在技术层面升级打击手段,还要求在治理理念、制度体系上实现深刻变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广领域拓展、向更深层次进军,真正实现从“治已病”到“防未病”、从“拔烂树”到“护森林”的跃升。

其一,健全集成高效的监督体系,破解“发现难”困境,以监督常态

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科技之眼”与“系统之网”。

监督手段上,可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贯通纪检监察、审计、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司法等多部门的智慧监督平台。通过数据建模、关联分析、异常监测,自动预警“影子公司”股权代持、异常跨境资金流

动、虚拟货币交易等“新型腐败”线索以及基层惠民资金拨付中的重复领取、违规截留等“微腐败”风险点,变人工摸排为智能预警。

体系融合上,应强化党内监督主导作用,推动其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特别要畅通群众监督渠

■万志彬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胜利召开,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新时代新征程,要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洞察反腐败斗争新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腐败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例如,有的通过“影子公司”“影子股东”代持股份,进行利益输送;有的利用职权或影响力,在项目审批、资源分配中为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却暂时不直接收受财物,而是约定“未来回报”;有的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等、境外交易等复杂金融工具洗钱、转移资产;有的“逃逸式辞职”,离职后利用在任职时的“余温”牟利。

这些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对市场经济秩序、金融安全、科技创新环境造成